

## 《诗经》颂诗再评价

成 项

《诗经》中有40首颂诗，其中的农事诗因为反映了西周初年社会生产情况应予以肯定，其他大多数为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的作品则不可取，而且颂诗在艺术上也比较枯燥——这是建国以来《诗经》研究者的共同看法。重读颂诗，我觉得对颂诗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文学应当永远为人民歌唱，只有深深地植根于人民的土壤之中，文学的花朵才会永不凋零——这是文学的一条基本规律。但是在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中，文化始终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因而中国旧时代的文学主要不是人民的文学而是统治阶级的文学。建国以来，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肯定。但是，有些作品至今仍然是人们不敢肯定的禁区，对颂诗的评价即为一例。为此，有必要在思想方法上进一步解放，以便对歌功颂德的作品重新确立一个正确的批评标准。

应该承认，很多歌功颂德的作品纯属点缀文治、粉饰太平的御用文学，它们无功而歌功，无德而颂德，成为掩盖旧时代黑暗政治的遮羞布，完全失去了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例如西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黑暗腐朽的政权，但它流传下来的庙堂乐歌却颇为壮观。这些作品是文学遗产中的渣滓，理所当然地应该予以否定。

但是，如果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所有的歌功颂德的作品都是不可取的，这就未免失之片面了。辩证法的否定观并非是对旧事物全盘否定，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说：“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犹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sup>①</sup>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相反，列宁没有粗暴简单地全面否定哲学唯心主义。在指出哲学唯心主义致命弱点的同时，列宁肯定了它在认识上应有的贡献。列宁这种否定之中有肯定的科学态度，是我们破除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一个极好范例。

全盘否定歌功颂德的作品，是把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简单化绝对化的结果。这种思想方式可以这样表述：历史上的剥削阶级只会对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决无历史功德可言，因而为他们歌功颂德的作品也自然应该被打倒，被否定。

对此，我们要提出两个问题：在历史某一阶段的某些统治者是否具有历史功德？如果他们具有历史功德，文学应该不应该歌颂他们？

从本质上说，旧时代的统治阶级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反动力量，他们的反动统治是历代人民受苦受难的阶级根源。马克思主义这一阶级分析的方法永远不会过时。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某一历史阶段（主要是在大革命后新生政权的上升阶段），某些清醒的统治者能够认识到人民革命的巨大力量，善于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为了缓和社会矛盾，防止人民反抗，维护本阶级的长治久安，他们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推行一系列对人民有利的政策，注意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调整上层建筑的某些部分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当他们推行这些政策的时候，旧时代的太平盛世就出现了，如西周初年的成康之治、汉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等。这些太平盛世，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漫漫长夜中的几线光明。它们的出现，固然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但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开明政治有关。不论这些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效果上，他们的政策和行动与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与人民的利益和愿望相一致，因而属于进步的历史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开明的统治者具有历史功德！

这样，出现在太平盛世的歌功颂德的作品就不仅仅是点缀粉饰，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历史的必然。盛世中那种阔大雍容的时代气象，那种对文治武功自豪喜悦的时代气氛，那种对未来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都要求也必然会在艺术领域中得到反映，作为时代最敏感的神经——诗歌，对时代情绪更不应该冷漠。这里有必要引用黑格尔在《美学》中的论述：“艺术的特性就在于把客观存在（事物）所显现的作为真实的东西来了解和表现，这就是说，就事物对于符合本身和符合自在自为的内容所现出的适合性来了解和表现。”

在作了如上论述之后，我们是否可以确立这样一个批评标准：对于歌功颂德的作品主要是看它是否符合历史真实；如果统治者确有历史功德，那么对其颂歌就应该予以肯定；如果歌颂的功德是虚假的，那么就应当坚决地予以否定。把歌功颂德的作品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根据不同情况给予具体分析，这样做比全盘否定，或许更接近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

## 二

《诗经》中的颂诗属于哪一种情况呢？它歌颂的是哪些功德？这些功德是否符合历史实际？是否值得歌颂？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把颂诗放到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

颂诗分周颂、鲁颂和商颂。周颂作于西周初年武、成、康、昭时代。鲁颂作于春秋时代鲁僖公之时。商颂旧有作于殷商和春秋宋人两说。本文同意后一种说法。周人对文武成康的歌颂易于引起宋人对先祖贤君成汤武丁的怀念，因而宋人写作祭祀成汤的祭歌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无论是鲁颂还是商颂都受周颂的影响，而且周颂占全部颂诗的四分之三，所以论述颂诗当以周颂为主。

颂诗产生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史记·周本纪》说，周公“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它说明颂诗是适应礼乐制度的需要、在政治清明、民情欢畅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

周公制礼作乐是公元前11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要旨是把尊卑等级的统治秩序牢固地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同时把艺术的教育感化功能（主要是乐）充分运用到政治方面。“乐以治内而为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和亲，异则畏敬；和亲则无怨，畏敬则不争。揖让而天下治者，礼乐之谓也。”<sup>②</sup>礼乐制度的确立，标志着新型统治秩序的建立和统一安定的政治局面的形成。西周统治集团并没有因此而陶醉在太平欢乐中，他们亲自目睹了殷王朝

施行暴政而导致的败亡，看到了人民在摧毁旧政权中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因此，总结殷亡教训、敬天保民、励精图治便成为西周初年政治生活中三大主题。统治阶层中一再发出“我不可不鉴于有夏，亦不可不鉴于有殷”<sup>③</sup>的呼声，他们认为长保天下的关键在于敬天保民。指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sup>④</sup>。鉴于殷末朝政荒废，他们主张勤于政事，励精图治，“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sup>⑤</sup>。为了获得民心，统治阶级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周公告诫成王，治天下要“先知稼穡之艰难”，可见周人把重农作为立国之本。《尚书康诰》说：“裕乃以民宁。”《立政》说：“其勿误于庶狱。”这些政策无疑会得到人民的拥护。重农裕民的政策直接带来了农业的繁荣。周初曾经有一个较长时期的丰收年景。周颂中《丰年》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万亿及秬。”《载芟》说：“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秬。”《良耜》说：“获之桎桎，积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栉，以开百室。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都是描绘仓廩丰实、妇孺欢欣的情形。政局稳定，政治清明，农业丰收，人民欢欣，这就是史学家盛称的成康之治。《史记·周本纪》说：“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

颂诗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人洋溢着朝气与活力的时代，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代。颂诗正是适应时代的需要，伴随着时代的节奏出现在诗国的土地。它主要歌颂汤武革命、统一安定、励精图治和农业丰收，也有纯粹祭歌，鲁颂商颂则多为仿效周颂之作。农事诗已有定评，本文着重论述其他几类作品。

颂诗盛赞的商汤文武都是革故鼎新的领袖，是一代盛世的奠基者，他们的历史功绩就在于对反动政权的革命。尽管这种革命属于统治阶级的内部调整，是以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权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政权，但它在减轻人民痛苦和推动历史前进方面却有重大的积极作用。据史书记载，桀纣都是倒行逆施、残酷暴虐的昏君。《史记·殷本纪》说夏桀不恤民众，夺民农工，侵人土地。夏桀自比作天上的太阳，但是人民指着太阳说：“是日曷时丧？予与女皆亡。”殷纣王比夏桀有过之而不及。《尚书·泰誓》说纣王“沈湎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斲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作威杀戮，毒痛四海。崇信奸回，放绌师保。屏弃典型，囚奴正士。”这样的暴君，这样的政权，难道还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么？推翻这样的昏君，难道不是莫大的功德，不应该大力讴歌么？

歌颂汤武革命的诗篇见于周颂和商颂。它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在革命准备阶段以自己的德政代替反动政权的暴政；在反动政权丧钟敲响的时候运用武力手段实现革命的目的。《商颂·长发》用了较多篇幅叙述殷人先祖契与相土艰苦创业的历史，其中特别突出了成汤以德政争取民心、成为当时诸侯实际领袖的事迹，令人信服地表明了汤武革命的历史条件。周文王一生的事业是为灭殷奠定基础。周颂中的《清庙》、《维天之命》和《维清》都是歌颂文王之德的诗篇。《清庙》以庄严肃穆的祭祀气氛烘托出祭者秉承文王之德的虔诚心愿；《维天之命》歌颂“文王之德之纯”；《维清》说“文王之典”给周民族带来了巨大成功。这些诗篇的共同主题是赞美文王之德给周人带来的巨大成功，表达了世世代代笃行文王之德的愿望。文王之德的内容是什么？诗歌中是不便交待的，史书中对此有记载。《史记·周本纪》说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尚书》中多次提到文王重视农功，体恤民众。笃行仁义，敬老慈少，礼贤下士，勤于政事，重视农业，慎狱裕民，祭祀上天——即为文王之德的内容。文王依靠这些德行赢得了人民的拥护，为武王伐纣创造了必要条件。所以王国维说：“殷周之兴亡，乃有德与无德之兴亡。”<sup>⑥</sup>

歌颂革命本身的诗篇再现了夏商之际与殷周之际的翻天覆地的历史事件,《商颂·玄鸟》歌颂成汤受天命征伐四方,统一了九州诸土,创建了商朝的统一大业。《长发》第六章直接描写了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战车上一面大旗迎风猎猎,大旗下成汤手持黄钺,指挥义军杀向敌阵。顿时战场上千车并驰,杀声震天,如同冲天烈火,摧枯拉朽,势不可当!诗中不仅反映了成汤革命的巨大力量,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正义对于反动的胜利,表明了正义力量的不可战胜!周颂中的《执竞》、《武》、《酌》是歌颂武王伐纣的诗篇。《执竞》说武王灭商的功绩举世无双;《武》歌颂武王继承文王的未竟事业,“胜殷遏刘,耆定尔功”,用武力制止了殷纣王对人民的杀戮,从而建立了盖世奇功;《酌》欢呼革命的胜利:“於铄王师,遵养时晦。时纯熙矣,是用大介。”是武王率领王师讨伐黑暗王朝,才迎来了一个光明灿烂的新时代。与商颂相比,周颂不是停留在对武力胜利和正义胜利的讴歌上,而是揭示出革命对于拯救生民和驱散黑暗迎接光明的重大意义。

这些颂诗的产生是由于生活在盛世中的人们怀念王朝事业的奠基者,希望通过颂歌表彰祖先的功德。同时也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的祖先在死后成为神明,能够把美德传给他们,并保佑王业长盛不衰。尽管这些颂诗有这样那样的历史局限,但是它们歌颂的是成汤文武而不是桀纣,是德政而不是暴政,是正义而不是反动,是光明而不是黑暗,是进步而不是倒退。为什么我们不能容忍这些诗篇呢?

武王克商后又消灭并降服了许多小国,周王分封同姓或异姓子孙做大小诸侯,使他们遵守周朝制度,向周王朝贡。于是大大小小的诸侯国都统一在周王朝的旗帜之下。“周初大封建,对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现象说来,多少含有统天下于一尊的意义,显然是一个进步。强迫奴隶制度的小邦接受周朝的封建制度,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sup>⑦</sup>颂诗中有一些歌颂全国统一、太平安定的诗篇。天下一统的阔大气象,巍峨壮丽的大好河山,蓬勃兴旺的时代景象,都在这些时代画卷中得到了展现。虽然颂诗作者在这些画卷上涂上了天命色彩,但他们的基调还是歌颂现实中的统治者,歌颂他们统一全国山河、创造太平盛世的历史功德。《桓》是一首太平颂歌。诗中描绘了万邦安定、年谷常丰的太平景象,歌颂武王受天命而享有国土,用兵统一了天下。这首诗大约写了武王时期,诗中透发出来的正是新时代那种蓬勃兴旺的景象。《般》创造了一幅群山起伏、大河奔腾的壮丽画卷,继而抒发了作者感慨:“敷天之下,衰时之对,时周之命!”普天之下,包括这些诸侯的封疆,都是周王朝接受天命而拥有的国土啊!自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时迈》是周王巡狩天下祭祀山川的乐歌。诗中一方面说上天保佑周王朝,周王是上天的儿子,从天命方面说明周王统一天下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说周王朝以巨大的军事实力震慑诸侯,天下莫不臣服于周,因此周王具有祭祀山川统治全国的权利;诗的最后归结到偃武修文,以美德施行于华夏:“载戢干戈,载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华夏。”诗中透露了天下一统的消息,也表明了周王长治久安的愿望。在阅读这些颂诗的时候,我们应该为中华民族的这些历史进步而感到喜悦,也应该正确评价统治阶级的功德,因为他们的功德与民族的进步密切联系在一起。

如何在胜利形势下保持清醒的头脑,巩固和发展革命成果,是新政权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颂诗中励精图治的诗篇对此作了回答。统治阶级在热烈亢奋的情绪中不无清醒的危机感,因而他们在祭歌中流露出对天命无常的敬畏。《敬之》一诗这样写道:“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作者反复申诫要警惕慎重,因为上天是那样明察秋毫,想保持天命岂是一件易事!不要说苍天高高在上,实际上它每天都在监临下土啊!怎样才能保持天命呢?诗中说要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以期达到思想光明的境界。最

后诗人感到责任重大，祈求上天显示美好的德行。它典型地反映了西周初年统治阶层中追求美德保持天命的情绪。勉力保守的愿望使他们决心效法先王勤政的风范。《我将》表示要以文王为榜样，夙夜勤政，安定四方。《賁》说文王勤劳一生，而对文王的最好纪念就是继承他的未竟事业，广布文王的恩泽，努力保持周王朝的天命。《昊天有成命》说文王受天命创立王业，而成王不敢贪图安逸，殚心竭力，日夜操劳，以此求得天下的安定。《闵予小子》、《访落》、《小毖》几篇，抒发了因为“家多难”而产生的警惕、痛惜、求助之情，一片殷勤思治之意见于诗中。周王朝还经常给天下诸侯敲响警钟。《烈文》谆谆告诫助祭诸侯不要肆意作恶，而应该发扬光大自己的武功，要依靠任用贤人来获得四方的顺从。诗的结语是那样语重心长：“不显维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西周初年政治比较清明，正是来源于这种励精图治的精神。

周颂中的《振鹭》和《有客》是迎客之作。《振鹭》赞美客人有美好的容貌和声誉，并祝愿客人夙夜勤勉以长保美名；《有客》表示殷勤留客之意。这种“歌功颂德”实际上如同《小雅·鹿鸣》一样，表现了人情中美好的一面。《天作》勾画了周民族从太王到文王的发展轮廓，实际上是一首民族发展史的颂歌。《鲁颂·駉》赞美鲁侯养马众多，略同《小雅·无羊》。这些歌功颂德的诗篇虽然没有表现进步的历史内容，但思想情趣基本健康，不要对它们轻易地否定。

颂诗中也有溢美之辞。据《春秋》和《左传》记载，僖公十三年和十六年，鲁僖公两次率师随桓公伐淮，前次不闻有战胜之事，后一次兴师无功。《泮水》和《閟宫》却大力铺叙僖公伐淮之功，这与西周初年颂诗创作的精神是相违背的。《毛诗序》有“变风”、“变雅”之说，我们也可以把《泮水》和《閟宫》称之为“变颂”。另外，周颂中的《有瞽》、《载见》、《雝》、《丝衣》，商颂中的《那》和《烈祖》，纯属祭祀之作，也没有多少进步意义可言。

总之，颂诗的主导倾向是歌颂统治阶级进步的历史功德，诗歌内容与历史事实基本上保持一致，纯粹祭歌和谀美之辞只是少数。因此，颂诗的歌功颂德应该得到肯定。

### 三

作为诗歌艺术，颂诗有没有美感魅力，对中国诗歌有没有独特的艺术贡献？

颂诗在艺术上不及风雅，与后来的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词更无法相比，这是每一个读《诗经》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但这种感受不足以构成我们否定颂诗艺术成就的理由。“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先辈提供了新的东西。”<sup>⑩</sup>颂诗的出现是在中国诗歌发展的筚路蓝缕的时代，它的某些创造性的艺术成就，诸如诗乐舞结合、四言体制、赋比兴、长篇巨制等等，不仅影响了后来的风雅，甚至影响了后代整个诗歌创作。

颂诗在当时入乐歌唱并伴有舞容的。《周颂·有瞽》说：“设业设虞，崇牙树羽。应田县鼓，鞀磬祝圉。既备乃奉，箫管齐举。”《丝衣》描绘了巫史尸祝的情形。《商颂·那》也说：“庸鼓有馥，万舞有奕。”这些都是颂诗与乐舞相结合的铁证。颂诗的乐谱早已失传，仅仅留下了歌辞，所以我们今天觉得颂诗形式板滞，但在当时大概是气象宏大激动人心的。这种诗乐舞相结合的艺术形式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体现了艺术发生的根本规律。《乐记》说：“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舞，动其容也；三者皆本于心。”中国原始艺术发生时就是以诗乐舞三位一体为其特征的。颂诗保留了原始艺术的形式，但比原始艺术又有进一步的提高：它不仅出于娱乐（主要是祭祀娱神）的需要，而且注入了重大的社会内容。由于《诗经》的经典地位，同时也由于这种形式符合艺术规律，中国诗歌从此便同音乐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的效庙歌辞、燕射歌辞自不必说，就是汉乐府、唐绝句、宋词、元曲都可以配乐歌唱。颂诗还

是中国戏曲的滥觞。陈子展先生《诗经直解》中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以巫舞为戏曲之起源，但看《楚辞·九歌》可知。彼似不知《颂》亦为巫史尸祝之词、歌舞之曲，有声容并茂之表演，正可视为戏曲之权与也。”

颂诗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定型诗歌。殷商以前无诗集，这使我们很难了解殷商以前的诗歌创作面貌。因此，论述中国诗歌体制当以《诗经》为据。颂诗的体制主要是四言，其中亦有杂言体。象《执竞》、《臣工》、《噫嘻》、《振鹭》、《有瞽》、《潜》、《雝》、《有客》、《武》、《载芟》、《良耜》、《丝衣》、《般》，都是标准的四言体。其余象《载见》、《思文》、《时迈》、《丰年》、《维清》、《维天之命》、《清庙》等诗，都是以四言为主，杂有二、三、五、六、七言。颂诗的体制与风雅相同。究竟是颂诗体制影响了风雅，还是风雅的体制影响了颂诗？按照文学的发生发展规律，我国诗歌体制源于民间创作。颂诗体制应该有它的渊源，但这种渊源不应该从后代去找，而应该从前代去溯源。古籍中记载的《弹歌》、《击壤歌》、《赧歌》、《南风歌》、《大唐歌》、《卿云歌》、《涂山歌》等等，以及某些甲骨卜辞、易卦爻辞，虽然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在体制上尚未定型，但其中不乏四言和杂言，可以说它们为中国诗歌体制作好了准备。颂诗体制正是在前代歌谣的基础上创建起来。颂诗的写作年代先于风雅，周王朝乐师最先接触的应该是颂诗。如果上述说法能够成立的话，我们是否可以据此进一步推测：周王朝乐师在对风雅进行加工润色配制音乐的时候，参考了颂诗的四言杂言体制，从而颂诗最终影响了风雅？如果这些推测都能成立的话，那么颂诗在中国古代诗歌的体制上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它代表了中国诗歌体制发展的第一阶段。

颂诗多用赋的手法铺叙各种场面。《有瞽》描绘合乐祭祖的场面，令人恍如听到钟鼓齐鸣管乐合奏的交响乐；《良耜》描绘丰收情景给人以强烈的感染；《载芟》写春耕场景如在目前。《振鹭》以洁白美丽的白鹭翔集在西郊圆池起兴，使人感受到主人对客人的美好情意。《小毖》是一首比体诗：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荇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  
姚际恒评点说：“愤懑蟠郁，发为古奥之辞，偏取草虫等作喻，尤奇。”<sup>⑦</sup>这首诗与《幽风·鸛鸣》有异曲同工之妙。颂诗中这些手法，经风雅发挥，成为《诗经》创作的一个重要艺术手段，并成为中国诗歌创作中形象思维的主要手法。

鲁颂中《泮水》和《阙宫》是长篇巨制。《泮水》八章六十四句，孙毓译点说：“大体宏瞻，然造语却入细，叙事甚精核有致。”<sup>⑧</sup>《阙宫》九章一百二十句，是《诗经》中最长的篇章。孙毓评点说：“《诗》长篇，鲜有逾此者。其格宏壮，其词瑰玮，其色苍古，其思沉密。首尾作室，中间祖德、侯封、祭祀、武功，次第铺叙。而赞颂福祉，作三项分插，整玩，宛如后世一篇纪功碑。”<sup>⑨</sup>

颂诗的主导思想倾向应该肯定，它对中国艺术有独特的贡献——既然如此，我们是否应该改变一下原来的观点呢？

#### 注释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15页。

② 《汉书·礼乐志》

③ 《尚书·召诰》

④ 《尚书·泰誓》

⑤ 《尚书·无逸》

⑥ 《观堂集林·殷周制度论》

⑦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

⑧ 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⑨ 姚际恒《诗经通论》

⑩⑪ 转引自陈子展《诗经直解》